钱江晚报 · 人文读本 · 晚潮专栏 96068 热线

【在文字的世界中,品读美好与力量】

扫码品读
更多晚潮专栏

掌故丛谈 |

《丑簃日记》里的几位书画家

唐雪 邵迎 张文心 编审

钱茗 同期逝去的背影

蓟门黄昏

等。

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

书林意境

和史

前些日子,有藏家拍得近世治印大家陈巨来给收藏大家吴湖帆刻的“铭心绝品”田黄印,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这枚印吴湖帆曾盖在自己所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等珍品上。《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后为浙江省博物馆珍藏。如今这枚印章又归浙博,可谓“画印重逢”了。吴湖帆《丑簃日记》1938年11月26日记录了他当年的购藏:“曹友卿携来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旦得此,为之大快。虽只盈尺残本,然是天壤剧迹,弥足珍贵,记此志幸。”日记未记购藏此卷的花费。吴湖帆重加裱装后,夫人潘静淑在画卷后隔水题“吾家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

“丑簃”(音yí)是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的别号。日记的年头是1931年至1935年、1937年至1939年。吴湖帆日记几乎每天出现当时交游的书画家、收藏家的名字,他们常在一起谈艺论画、鉴赏古物、填词赋诗。而沈尹默、刘海粟、王季迁、徐邦达,在日记里更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的记录,足可含玩。

1937年5月7日写道:“沈尹默来,大谈书法,云力避北海、襄阳、松雪三家习气,而以不留意,时有流露,益见李、米、赵魔力之大。”此亦可知尹默书法受李北海、米襄阳、赵松雪影响之巨。日记记载:吴湖帆说尹默书法“似薛道祖”,尹默“大以余为知己”。道祖,即薛绍彭的字,号翠微居士,长安人,宋代著名书法家。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吴湖帆说尹默字有道祖风,尹默引为知己。沈尹默1883年生人,此时55岁;吴湖帆1894年生人,此时44岁。

这一天的日记里还写道:“尹翁今年五十五,而且目力已衰至极点,然书兴甚浓,因除此外无可遣,并云连阅书报多不能,甚苦甚苦。”这也可知尹默此时视力甚弱,“甚苦甚苦”道出尹默心情。

沈尹默1939年离开上海抵重庆,但离开的日期,他自己没有记录。吴湖帆日记提供了线索。1939年4月27日记载:“今晚为沈尹默先生有昆明之行饯之,而临时尹老因目疾不能来为憾。”5月1日记载:“五时……余驱车至沈尹默处,未晤而归。”5月1日傍晚往访尹默,不遇。此后的日记不再有见到尹默或与尹默聚会的记载。据上述日记推算,尹默前往重庆应该是在1939年5月1日左右了。

我年少时,醉心于刘海粟油画的色彩瑰丽、用笔遒劲、气韵生动、沉雄苍古、大气磅礴。所以每不以对海粟先生的非议为然。吴湖帆的一条日记,颇有意味。1938年1月7日记载:“午后为刘海粟题吴文中《武夷九曲》卷。此卷殊精绝,为文中画中仅见者,向为汪向叔物,今归海粟矣。海粟前数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备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今购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为善,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

吴文中,即吴彬(字文中),明万历天启年间画家,福建莆田人。明代著名学者谢肇淛不轻许人,但在《五杂俎》卷七中,数次提及吴彬,且对吴评价甚高。汪向叔,收藏家,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吴湖帆上一年11月22日的日记里已经记录说海粟“新近于离乱中”得到汪向叔这件旧藏。刘海粟1896年生人,此时43岁。吴湖帆1938年1月7日的日记既记录了刘海粟的艺术变化,亦道出了对一个人学艺“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的规律的认识。也表明吴湖帆还是许可海粟为“学者”,海粟经过少年的反叛期,“仍回学者本色,勇于为善”。

王季迁是吴湖帆开门弟子,后来去了海外。《丑簃日记》1938年2月24日有记载:“午前季迁来,被余大骂一顿。不告取物,索必取归了事。季迁接近浮滑,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故迫令取归,以儆其藐视事端也。余素不轻易骂人,且小节不拘,此次因其胆大太妄,故特别训之,然余自恨平日太纵爱之也。”

吴湖帆严责弟子,但更自责。王季迁系1906年生人,日后也成就为中国书画研究、鉴定和收藏的大家,声名卓著。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年轻时候的故事。《丑簃日记》公开出版是2004年9月,季迁先生则在上一年去世了。王季迁1973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吴湖帆先生“光风霁月”,“湖帆先生出身世家,天资卓著……一辈子好学不倦,从不表示自满;对于后进者又那么恳恳切切,提掖不遗余力”。这个时候,吴湖帆先生去世已经有5年了。

1937年3月11日的日记里写到了王季迁和徐邦达。

徐邦达1911年生人,比季迁年少5岁。这是一个大晴天,南京委派舒楚石到上海为全国美术展览会故宫古画“来商接收办法”。吴湖帆推荐徐邦达为舒楚石做助理,日记里写道:“邦达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能实做。”

1938年2月24日的日记也写了徐邦达的一件事:“午后……博山、巨来、邦达相继来。邦达看了山樵若干时即去,去时犹留恋不舍,云明日能再来许观否?余诺之而去。”2月26日记载:“邦达来,专为看山樵《煮茶图》。”这几条可以见出徐邦达做事实在,学艺用心专注。徐邦达先生后来成就为中国书画研究及鉴定大家,也是所来有自。邦达先生也已在2012年去世了,得享百岁高寿。吴、王、徐三位先生,以邦达先生最为长寿。

顺带说一下,《丑簃日记》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变局、七七事变后的淞沪会战所做的报纸新闻摘录和当时身居上海的亲见亲闻亲历,约有七八万字,尤其淞沪会战三个月期间,每天日记几乎均为战事记录。书生亦心忧国事,这部分日记我想是能够作为抗战史研究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的。

吴湖帆,苏州人,《丑簃日记》手稿连同吴湖帆先生其它遗稿,均已入藏上海图书馆。

卜居钱塘 |

东岳庙记

子张

书画研究

本名张欣

入浙随缘录

著有

新诗与新诗学

教授

及诗集

学者

此刻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一些书

等。

一些人

清谷

十八年前初上吴山,意外地撞见东岳庙,一下子拉近了我与杭州的距离。

我本岱下人,中年卜居钱塘,既非谋食之需,亦非由“乐山”转为“乐水”,只是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担心自己就此醉生梦死下去,实在太对不起“行万里路”那句老话。至于选来选去选定杭州,那也只是机缘巧合,最多说明我和杭州的缘分更多一些罢了。

吴山,乃杭州老城区的制高点,站在吴山最高处,则湖山胜概一览无余,所以到了杭州,吴山是不能不去的。

那天落着凉凉的秋雨,我从胡庆余堂右侧一条石阶窄道上去,七转八转,逢路而行,完全没有东西南北的概念,且仅至城隍阁而止,江湖汇观亭是多年以后才又偶然涉足的。故而即使在吴山之上,也仍如置身于丛林之中,所遇皆为婆娑的古老樟树,并未能领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宏观画图。可是,在要从另一处下山时,却突然看到一个较大的院落,门虚掩着,门外仿佛有块文物保护石碑的,但又不像是开放的游览区。

我试着推门进去,倒也无人拦阻,但见院子里砖石瓦块一片狼藉,进门处对着大殿有个戏台,也很陈旧的样子,大殿那边搭着脚手架,几个泥水工正在施工。应该挂在殿门左右的巨大木质楹联躺倒在大殿一侧,殿里面还什么也没有。如果我没记错,那联语应该是“岳重岱宗先衡华嵩恒立极,帝司木德合火土金水以同尊”,好像是黑底金字。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刚刚开始整治的文物。

虽然没有形成东岳庙的完整印象,而遇见东岳庙这件事本身却让我有一种亲切感。也就此知道,原来在泰山之外,还有对泰山神比较普遍的崇仰。这说明在古代,东岳大帝并不止是山东一地的神灵,其南下的时间若依据“大观中造”的说法,要比李清照的“南下”还早得多哩。

泰山学者周郢对这一问题阐述甚祥,其《天下东岳庙》文中云:“赵氏帝君对泰山崇祀始终不替,促使东岳庙祀在南北进一步普及,真正发展成全国性祠庙,因此两宋可谓是东岳庙发展史上的一大高峰期。”周文对浙江境内自唐至南宋期间构建东岳庙情况也有简要解说,比如杭州之外,“其他州县亦多有岳庙建置,见于历代方志中所记者多达百七十余座。”

那次吴山归来,我也搜寻过杭州的其他东岳庙,由地图上的“老东岳”地名按图索骥,跑到西溪路上探访过一回。不过那时候法华寺、东岳庙皆未恢复旧观,所谓东岳庙只是一处小小的房舍,门闭着,门外残烛如落红,使人想象到香火之盛。

《武林旧事》《梦粱录》诸书对东岳生辰日香火事均有叙说,只是一简略一略详而已。《武林旧事》惟“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半句,《梦粱录》则不但列举了东岳天齐仁圣帝之“行宫者五”,更对圣诞日之吴山庙“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的盛况作了生动描述。

毫无疑问,在特殊年代,杭州东岳庙的命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成为大杂院为百姓遮风避雨,已是最好的结局了,也算真正尽到了一点护佑平民的责任……